

第 1 章

苦难的童年

故乡和身世

阳新县在湖北省东南部，长江南岸，幕阜山脉北麓。在地形上属幕阜丘陵东部盆地。丘陵多在海拔 300 米左右，西高东低，盆地底部地势低洼，一般在海拔 50 米以下，最低点为网湖沙城嘴，海拔 11.6 米，在长江平均水位以下。因此，在阳新盆地即湖泊，平原也是人工排水的湖沼。全县有大小山峰 411 座，大小河流 365 条，大小湖泊 109 个，是全省湖泊最多的县之一。解放前，阳新县防洪排涝能力很低，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是个有名的贫困灾区。

阳新县古称“吴头楚尾”之地，历史悠久。东汉末年开始设县，初名下雒，属江夏郡。三国东吴时改为阳新县。此后历代以富川、永兴、兴国等名置郡、府、州。清末时名兴国州，属武昌府，民国三年（1914年）

废州为县 复名阳新。它位于鄂(后为武昌)江夏、浔阳(后为江州)豫章(后为洪州)之间 滨临长江 隔江与田家镇要塞相望,其间有座半壁山 峙立江的南侧 山势陡峭 水流湍急 素有“长江锁钥”和“铁锁长江”之称。境内山峦起伏 湖泽密布。又东近武穴 北倚大冶 南靠幕阜山与江西九江相邻 扼长江和鄂、湘、赣三省要冲 是武汉三镇的门户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相传春秋战国时期 武子胥曾驻兵于此 今遗址尚存。明末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曾率部转战于此,最后战死于毗邻的通山县九宫山。近百年来 这里发生了多次战争。太平军曾在此与曾国藩的湘军展开恶战 我村的附近并有太平军的“万人坑”。

阳新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25年这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小组 1926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阳新县委员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农民自卫队、儿童团遍及县内各地。1927年初,阳新的工农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对此非常恐慌,同年2月27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二七惨案”成子英等九名革命者惨遭烧杀。1929年8月至1930年5月,李灿、何长工和彭德怀同志率红五军第四、第五纵队开辟了以阳新为中心的鄂东南革命根据地;1938年9月24日日寇侵占阳新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 在此建立了鄂南敌后抗日根据地 王震、王首道、张体学等同志 都曾率领部队在此战斗过 牺牲很大 成为全国第一个烈士县。

我于1912年11月22日出生于武昌府兴国州(今阳新县)福寿区(今陶港区)青龙乡贾家门前屋的一个农民家庭。我们村

子位于网湖边上 水涝 旱灾频繁发生 我们乡下有句民谣：“下雨水滔滔 无雨像把刀 形容田地干旱 硬裂如钢刀”)大水多次把村里种的田地和房屋淹没，血吸虫病猖獗。记得有一年村里受灾 颗粒无收 灾后瘟疫流行 真是贫病交迫。我父亲万般无奈，只得只身到黄石港向友人借贷，买了一小船蚕豆回来，以度难关。

我小时候听老人讲过不少战争故事。在我记事时第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逃反’。当时军阀混战 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在我县拉兵拉夫 奸淫掠夺 无恶不作 闹得人心惶惶！一天夜里 我突然被惊醒，发现自己在父亲的背上，他气喘吁吁地向船上跑，我急问：“干什么？”父亲小声说：“逃反。”并不让我出声 怕被附近的北洋军队听到。我们就与村里几个人一起坐船划到湖中心的道士山去躲避 以后遇到我不听话时 父亲还常用‘北洋兵来了’和‘逃反’来吓唬我。

长期的天灾人祸，使我的家乡成为有名的贫困地区。

我的家境也随着战乱和天灾而时起时落，曾祖一辈尚能温饱。我的父亲贾义生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讲究忠孝仁义，且写得一手好字。但由于祖父早死，家境衰落，靠祖母守寡抚养成人，以后成家靠着祖父留下的三亩多田，自耕自种维持一家生计。母亲袁氏是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农村妇女，为了养活孩子，除了不能下水田外 什么农活都干。她生了四男三女 我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姐叫大顺 二姐名细顺 大弟凤成 二弟东成 最小的弟弟是北伐军到来的时候生的，父亲为他取名叫平等。九口之家靠祖父留下的三亩多田，自然生活日益艰难。父亲为了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想尽了办法，他主要是种田，也做过工（榨油、织布）开过小鱼铺 还教过书 真是士、农、工、商行行做过 但想养活一家还是十分困难。在迫不得

已的情况下，只好把我的二姐和小妹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二姐从小就给宋家山姓陈的人家抱去了，小妹生下只几个月，连名字也未取，就被一个姓冯的穷苦人家领走，给她取名“等”，等就是等着生个男孩给她做丈夫的意思，藉以讨个吉利。骨肉分离，最感痛苦的莫过于我的母亲。在二姐和小妹妹被抱走之后，她常常暗自哭泣，尤其是知道我的妹妹后来生活过不下去靠乞讨为生，更令其痛心至极，每日以泪洗面。无奈自顾不暇也没有办法。当时风气渐趋开化，不少地方开始提倡妇女天足，可是阳新地区比较闭塞落后，我的母亲仍然要给大姐缠足。每当我见到大姐被迫缠足而浑身发抖，痛苦不堪，放声大哭时，总是帮着姐姐向母亲求情，苦苦哀求道：“别缠足吧！”你看姐姐多么可怜！”母亲自己也饱尝过缠足的痛苦，有时也发出同情的叹息，但她却总是无可奈何地答道：“不行呀，不缠足，将来嫁不出去，怎么办？”我当时天真地回答说：“嫁不出去，就留在家里好了，我将来养活她不行吗？”母亲听后只是摇头苦笑了一下，仍继续把姐姐的脚紧紧缠裹起来，这并不是母亲不疼爱女儿，而是她受旧观念的影响太深，一时无法解脱出来。

我的父母满以为把两个女孩送给人家之后，只要他们勤俭持家，其他五个孩子都可以养大成人了。其实不然，后来我的二弟凤成，三弟东成先后患了天花、麻疹，因无钱医治，一个接一个夭折了。最小的弟弟平等也由于从小营养不良，以后得了肺结核病，拖了几年，13岁时，也离开了人世。

我从小跟在父母身边劳动，帮着干点轻便的农活，先是放牛，以后种地插秧都学着干，冬天还跟着父亲去湖里捕鱼。父亲榨油、织布，也把我带在身边，帮他做些辅助劳动。由于父母的辛勤劳动和家庭负担逐渐减轻，家境日渐改善，除了满足全家五口的吃穿外，还陆续买进了一些田产，此时共有水旱田十来亩。

入私塾、小学和县中读书

我出生时，母亲在床上发现一条小蛇，当时有封建意识，认为是个好兆头，尤其见生下是个男孩，父母心中更是喜不自禁，便给我取乳名“龙成”，表示望子成龙之意。这时家境逐渐好转，我又是长子，7岁那年父母便决定送我上四叔贾万宝任教的私塾读书，并取学名“再恒”，希望我求学有恒。四叔教学严谨，背诵书要求不打嗝巴，在他的严格教育之下，我当然不敢怠惰，学习成绩颇得好评。他在我村修族谱时，曾为我写有“颖悟过人，来日定当为家族争光”的评语。四叔后因家中人口日增，教书难以糊口，乃挂牌行医。父亲便送我至张谷才私塾，受教于我乡有名塾师冯伯竟先生。一年后冯先生停教，父亲深恐我学业荒废，不得已就亲自在我村设馆教了近一年的书，由此足见父亲爱子之心真是无微不至。

我在私塾先后读了五年书，在这五年中除农忙时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外，其余时间都能安心读书。我读了《三字经》、《幼学》，还读了《四书》、《五经》（五经中易经、礼记未读）和唐诗三百首，并开始学作诗，虽此时多是囫圇吞枣，没有深刻理解其意，但仍得益不小。

1924年春天我12岁时，我考进了福寿区（现为陶港区）高等小学。这是一所由当地有关人士为适应时代，发展区内的文化教育，筹措经费，遴选师资而创办的一所新学堂。校址最初设于江云的江氏宗祠内，因房屋少，建筑陈旧，不久即迁往张氏宗祠内。此处不仅房屋条件较好，而且四周围绕着树林、田野和池塘，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福寿区高等小学迁到张氏宗祠后，得到当地人士的支持，他们为了保证学校用房，搬迁、腾让祠内原有的

私塾用房，并为师生添置生活和学习用品。当地人士为了方便学生学习，新开设了文具商店。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英语、历史、地理等。校长罗锦早年致力于科举，后来毕业于省立博物馆专科学校，曾在县内公私学校执教多年，教学经验丰富。建校初期，教师力量较薄弱，老师多为小学毕业。为此，当时有一批在外地读书，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士表示不满，引起一番激烈争论，要求提高教师水平，以免误人子弟。后来，学校不断充实教师队伍，提高师资质量。先后在校任教的知名人士有著名中医冯惟贡，其文学水平较高，受到各界人士的尊重，还有晚清秀才贾楚卿等。我学习努力，成绩较好，特别是国文受到以上老师的教育，进步也较快。

我高小毕业后，于 1926 年春考入湖北省立阳新中学校。这所学校创办于宣统二年（1910 年），原名为兴国州中学堂，是阳新县创办的第一所中学。

兴国州中学堂最初实行清朝光绪年间的“癸卯学制”。其办学的宗旨主要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大端。实行春季招生，修业期限为五年。开设课程有修身、经学、国文、英文、历史、地理、数学、博物、格致、图画、体操等。各课教学内容均由教员自编教材，自选范文，自定标准。学生在校期间着装统一（夏白冬青）。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政府明令将所有学堂改称学校，兴国州中学堂随之改名为阳新县中学校，执行民国元年颁布的“壬子学制”，修业期限四年。学校废除前清所提倡的“忠君”“尊孔”等办学宗旨，取消“经学”“格致”两课，增设物理、化学、法制、手工和乐歌等课。采用商务印书馆按部颁教学大纲编印的教材。

1922 年政府颁布“壬戌学制”。学校实行新学制，规定修业

期限为三年。校名改为“湖北省立阳新中学校”。课程设有社会、算术、言文(包括国、英两门)、自然、艺术、体育等六门。学校当时设在县城孔庙内,共有两个班,约百余人。我初进一年级,乡里人能进城里读中学,感到很新鲜,也觉得很不容易,更加努力学习,但只读了一个学期。同年秋,北伐军攻克阳新,局势大变,社会开始动荡不安,学生大量退学,教职员工因待遇过低而纷纷离校,学校被迫停办。我也就停学回乡了。

无论在私塾、小学和县中,我都对语文特别感兴趣,在课余也常读《古文观止》一类书籍,故在学校作文成绩较好,备受老师赞许。父亲看到我各科成绩都还不错,语文成绩特别好,也很高兴,但又有些怀疑作文不是我自己做的,每次回家(当时我住在学校,每半月才回家一次)第一件事就要我将作文背诵出来,还要求我多读、多想、多写、坚持不懈。父亲对我这样严格要求,使我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并且有了较好的语文基础和通晓了一些历史知识。真是“黄金未为贵,师严价更高”!我的父亲既是慈父又是严师,言教身教,对我影响最大,终身难忘。

震惊幼小心灵的乡村械斗

阳新乡村当时由于地产和其他家族纠纷,大小械斗时有发生。在我幼年时期,曾遇上过两次震惊心灵的械斗。时至今日,每当我回忆童年往事,仍然心有余悸。

一次是同族相斗,发生在我6岁的时候。事件起因乃由于贾氏聚族而居,是当地的大族,在贾家门前屋村居住的一百多户,分为六、七、八三房。七房人丁兴旺,又出了一个秀才贾肇光领头。这个秀才仗着人多势众,在乡里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常欺压六房和八房的人,许多人敢怒不敢言。此次,七房秀才一家人为

了霸占六房一块宅基地，强行在这块宅基地上树起一块界石，六房的人自然不能答应，引起争执。秀才蛮不讲理打了我的二叔公。我的父亲至为气愤，认为秀才的七房既霸占六房宅基地，又打六房的人，真是欺人太甚。全六房人都感到咽不下这口气，于是自然而然地聚集到我家中商量，你一言我一语，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这次要同七房斗争到底，一定要把霸占的宅基地夺回来。当时个个怒气冲天，摩拳擦掌。于是在当天晚上，父亲和四叔带着全房的青壮年手拿棍、棒、刀矛和锄头，一齐冲出去把七房树立的界石拔掉，再立起了我们六房的界石。七房的人见六房的人这次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又很有准备，也感到自己理亏，七房内部也有人反对秀才恶霸行为，他们闭门不出，未敢抗拒，因而这一场残酷的械斗，幸未发生。然而各家的妇女和孩子，由于从过去的械斗中看到打得伤的伤、死的死的悲惨情景，大家都十分担心这次同族间的械斗，特别是我的母亲哭得格外伤心，因为她知道这次我父亲是领头人，很可能招来不测之祸，万一两房人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一家大小怎么活下去呢。那天晚上我在床边见到母亲在床上哭，也抱着母亲哭成一团，直到父亲和六房的人平安归来，才使我们全家放下心来。但是七房秀才对这次失败并不甘心罢休，他自以为秀才会动笔杆子，乃恶人先告状，告我父亲和四叔占他的宅基地，以至对簿公堂。被我父亲、四叔据理力争把秀才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最后他以败诉而告终。从此再也不敢张牙舞爪，随便欺负人了。村里人都说，秀才竟败在了一位年轻人手里。

另一次是异姓械斗。我们家乡的网湖，其边缘地区，每到秋天湖水下落，水草长得很茂盛。湖中水草可以喂牛、喂猪，乡里人常为争夺这些水草地占有权，发生争斗。在我 11 岁那年（1923 年），一天父亲正外出办事，不巧就在这一天，我村的人在割草

时，与邻村张家湾的人发生争执，我堂兄肇先竟一怒之下大声一吼，纠集村里一百多人，拿着棍棒、刀、戟等冲到网湖边同他们打了起来。在这场混战中，张家湾有三人（二男一女）被打死了，我村也有一些人被打伤。张家湾因死了人当然不肯罢休。他们一方面到县衙门告状，同时准备再与我村拼个你死我活。当我父亲闻讯赶回时，无奈祸已铸成，无可挽回。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造成更大的悲剧，他一面严斥堂兄不应带头闯祸，另一面主动提出与对方谈判，表示愿意赔偿损失和安抚死者家属。但张家湾已向县府告状，指控我堂兄肇先为凶手，四叔为主谋，声言非将主谋和凶手捉拿归案抵命不可。我父亲想到堂兄和四叔毕竟是自己亲属，而且四叔对此次械斗事先也不知道，确实冤枉，既被指控为凶手和主谋，就必判重刑。父亲准备自己主动到县里去顶罪坐牢，这样可能会得到从轻处理。他对我母亲说：“我要去顶罪坐牢，进了牢里，可以结鱼网维持生活，不用几年就会出来，家里生活可能会苦些，你一定要带好孩子，等我回来。”母亲一听到这些话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大哭起来，她心里明白我父亲的仗义行为，但是亲人无罪，替人受过坐牢，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我在一旁听到父亲的话和看到母亲痛哭的情景，吓得大哭起来。正当这时，县里来了十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当时称洋枪队）来村捉拿凶手，全村老小几乎都逃走了，只有父亲却拉着我不逃，沉着地应付，以免那些警察找借口放火烧屋和洗劫财物，从而招来更大的灾难。我父亲除了用饭菜热情款待外，还要我向那个警长下跪求情，同时随警察同来的张家湾人，也向警察说明贾义生是好人，此事与他无关，我们并没有告他。因此警察没有逮捕我父亲，因村里其他人都逃走了，捕不到一个人，只好悻悻而归。以后经官民多方调解，最终以巨额赔偿结案。为了这个赔偿，把贾门前村祖宗传下来的公共财产全部卖光了。

乡村械斗均发生在我幼年时代，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日后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使我把父亲孝顺祖母、为人仗义、乐于助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二、使我认识到械斗的残酷性，轻则致伤致残，重则置人于死地，而且还为此倾家荡产。这种同族同乡人自相残杀实在害己害人，应该引为殷鉴！

当儿童团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和领导下，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妇女、学生等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湘、鄂、赣等省的农民运动更是汹涌澎湃，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有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与北伐军共同战斗。

北伐战争开始后，由于得到工人、农民的积极支持，北伐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湖南等省，包围了武汉，不久就打败了北洋军阀吴佩孚所属的王占元、陈家祐的部队，1926年秋又来到了我们阳新。北伐军官兵人人佩戴着“爱国家、爱百姓、不怕死、不要钱”的字符，官兵同穿草鞋，部队纪律严明，对老百姓不仅秋毫无犯，而且处处帮助百姓，同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形成鲜明的对比，所到之处都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我们阳新中学学生革命情绪更是无比高涨，上街游行和登台演讲，热烈欢迎北伐军，县城里洋溢着派革命气氛。后来，县中停课，我回到家乡，看到农村也出现了一派欢腾景象，令我兴奋不已。

由于阳新县农民一直与贫苦挣扎、搏斗，他们积极拥护北伐军和农民协会的主张。家乡的农民协会、儿童团等革命组织，也很快建立起来了。我的二伯贾方南任农会会长。我被推举担任儿童团团长。

参加农民协会和儿童团最积极的是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和他们的子弟。我们唱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并到处贴标语 喊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坚决与土豪劣绅的罪恶行为作斗争 并反对旧风俗、旧习惯 如赌博、敬鬼神、妇女缠足等等。贫苦农民兴高采烈，而土豪劣绅则胆颤心惊，不少人都逃往城里去了。

我当时仅有 15 岁 被推举为儿童团团长后 常常拿着铁棍跟着大人去斗争土豪劣绅，也常常自行带领着儿童团员去斗那些平日欺压老百姓的坏人，不分亲疏，不管是不是本族的，哪怕是至亲、好友，只要他们欺压老百姓就进行斗争。其中有一个我的本家，是我一个要好同学的父亲，就被我们斗得直讨饶，吓得他再也不敢对农民作威作福了。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接着又在武汉地区策动夏斗寅部叛变革命，后来夏部被骁勇善战有“铁军”之称的北伐军叶挺的部队打败，其残余部队逃窜到阳新一带，疯狂镇压农民、学生运动。本地一些被农民斗得表面老实、或逃出去又回来的土豪劣绅与夏斗寅等的部队互相勾结，大搞反攻倒算 杀人放火。1927 年 2 月 27 日，在县城里成子英等九名工会、农协、学生会的成员 被他们捆绑并用棉絮包起来 浇上火油 活活烧死，真是令人惨不忍睹，这就是阳新有名的“二·二七惨案”。

面对这种白色恐怖 革命者并没有被吓倒 他们仍继续组织农民同敌人作拼死的斗争，常常昼伏夜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的家乡成了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焦点之一。由于农协武器装备远远不如敌人，只有一些刀矛之类的武器，因此付出的代价更为巨大。此时儿童团活动被迫停止，我在家无事可做 父亲怕我外出惹事 要我教私塾 教几个堂弟和堂侄 将近一

年。

由于我当儿童团团长，斗争比较积极，得罪了不少土豪劣绅，在出现一片白色恐怖之后，父母为我的安全十分担忧，他们认为那些土豪劣绅是肯定不会放过我的。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母亲说：“龙成这孩子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也是国家的孩子，还是想法让他脱离虎口吧！”为了使我免遭不幸，1928年父亲便带着我离开了家乡，去黄石港谋生。就这样，年幼的我便与儿童团和农协会失去了联系，尽管保住了个人一时的安全，却使我走上了另一条坎坷、艰难的道路。

随父亲背井离乡

1928年父亲带着我离开家乡，从武穴搭小轮船溯长江而上，到达黄石港登岸。他关照我留在码头上看管好所携带的四件行李，就去找朋友来帮忙。当时码头上很乱，偷窃的、结伙公开抢劫的都有。我又是第一次出远门，年幼无知，话听不懂，心里直发慌，真盼望父亲早点回来。可是一等再等，总是不见他回来，我简直急得快要哭起来了，但又怕哭出声来，引起坏人的注意，认为我弱小可欺，只得勉强忍着。这时正有人从我身后将一件行李推到他自己的脚下，并且还有一只行李包已被一个歹徒偷偷地拎到手里，我于是鼓起勇气将坏人手里的包夺回来，再把另一件推倒的行李也放在自己面前。

正在我难于应付的时候，父亲带着他的朋友来了，真使我喜出望外。旁边坐着的一位老人对我父亲说：“要不是这个孩子机灵，你的行李包可就没有了。”我父亲为此感到很高兴。他的朋友知道码头上情况复杂，不能久留，便催促我们带着行李赶快离开。

父亲把我带到他朋友安排的一个地方住下，便买来一部木制土织布机，要我跟着他一起学织布，以维持生活。而我们对浆纱技术不熟悉，浆出来的纱很脆，老是一碰就断，这样非但赚不到钱，反而要亏本。于是我向父亲提出，这种活我干不了。父亲也感到我年龄还小，不适宜干这种活，只得停下来另谋生计。他又怕我荒废学业，影响前途，总想还让我读点书，苦于学费无处筹措。我父亲到处奔走，总算得到朋友的帮助，借了点钱与人合伙开了一片小鱼铺，每天的收入除了 糊口之外 还略有剩余 经营了一段时间，他便决定送我去武昌继续升学。

1929 年春，父亲将我送到武昌，我考进了私立荆南中学读初中二年级。这所学校坐落在蛇山之麓，历史较久，设备也较完善，教师水准比阳新县中高，是武昌一所小有名气的中学。

我一个初离乡井的农村清寒学生，进了大城市这样一所学校求学，深感来之不易。1929 年年末，正当我发奋读书的时候，突然接到父亲朋友发来的急电：“父病重速归。”我当时即预感到情况不妙，急得大哭起来。思前想后，越想越多，越想越愁。回忆我父亲为了养活我们一家老小，为了送我读书，几乎年年月月，不分白天黑夜地操劳，耗尽了心血；想到他多次为了逃避战乱，背着我逃难；再想到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总是不顾个人得失、安危，挺身而出，为之排忧解难，他凡事讲忠恕，忍让为怀，劝人为善，宁肯自己吃亏，决不占别人一分便宜，所以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要是失掉了这样一位好父亲，我和我的一家怎么办？

当我向学校请准假坐船回到黄石港时，传来了父亲已经去世，遗体用木船运往田家镇的消息。我更是心如刀割、痛不欲生，但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希望这不是事实，想尽快赶到田家镇去了解究竟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当我到达田家镇，母亲也带着小弟从家中赶来了，悲惨的场面，使我如梦初醒，父亲是真的永远离

开了人世！我们家的顶梁柱倒了，全家人的唯一依靠没有了，今后一家老小的日子该怎么过呢？在我叔叔和父亲生前朋友的帮助下，就在田家镇草草地将父亲安葬了。

我母亲考虑到家乡的情况和我的前途，要我向亲友借点钱继续回武昌读书，但借钱读书能有几分把握呢？那时对我来说，真像是茫茫大海里的一叶孤舟，随波逐浪，不知何处是归宿，最后只得遵母命返回武昌。

第 2 章

失学当兵

借钱受辱，愤而当兵

1929年11月间，我办完父亲丧事后，回到武汉，仍在荆南中学读书。这时与阳新家乡母亲、弟弟的联系完全中断。我在武汉读书的学费和生活费毫无着落，只有依靠表叔冯康平的资助。康平表叔很早就离开家乡，后来回阳新时来过我家，与我父亲的关系较好。这时他任武昌第七小学校长，生活并不宽裕。康平表叔看在与我父亲的情分上，再加上见我年纪轻，想读书，所以对我还好，愿意给些资助。我的表婶娘情况就不同了，她认为帮助我读书，是她家一个负担，总是有些不愿意。为了读书我就更加省吃俭用，勤奋学习。

住校的宿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为了节省这笔费用就搬到武昌三道街阳新同乡会会馆的一间小屋子里与人合租。当时阳新人来往于武汉时都可住在那儿，不

需付房钱。我自己又买了个小洋油炉子，每天自己烧稀饭买点咸菜，或下点面条充饥，至于添衣服和零用钱就更谈不上，生活极为艰难。这种艰苦的生活对我是一个磨练，培养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因为缺乏营养，我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了。国难当头，家庭离散，生活的艰难，社会的不平，人情的冷暖又促使我拼命读书，总想多读些书寻找出路。我常思念在乡间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弟，因家里缺乏劳动力，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比我还苦，这就更加激励自己刻苦读书。

学校要缴学费了，米也吃光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向表叔家走去，因为我非常不愿意和害怕见到表婶娘，她那冷漠的面孔总是刺痛着我幼小的心灵。表叔家住在武昌汉阳门附近。因为没有米了，我中午饭也没有吃，下午一点多钟走进他家。那天表叔不在家，表婶娘正在和人搓麻将。她见我来了装作没看见，我叫了一声：“表婶娘。”她理都不理，照样有说有笑地与人打牌，我只好站在一旁不再吭声了，就这样万分无奈满腹心酸地站了一个多小时，眼泪在眼眶里滚动，但我对自己说：绝对不能哭出来。就在这时，表婶娘骂了一声：“倒霉！”原来她今天手气不好，连输了好几盘，于是就把火发到我头上来了。她抓起一张五元的钞票向我扔过来，还狠狠地骂我：“穷鬼！”我一听她骂我，这般瞧不起人，就再也忍不住了，把钞票拾起来撕成碎片扔在地上，扭头就走。我一面哭，一面走，心想：我宁肯饿死也决不再向她借钱了。

然而这茫茫大千世界，何处可去呢？别说交不出学费再无法读书了，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又怎么能熬下去呢？我一个才十几岁的小孩子，就被生活逼得无路可走，尝到了人间的辛酸苦辣。我饿着肚子，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在黄鹤楼与蛇山之间没精打采地踱来踱去。我想到了母亲，就很想回阳新去，可又不敢回去。

音讯隔绝我无法了解家乡的情况，再加上回家的路已被封锁又无路费，身边仅剩几角钱了。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踱来踱去，最后荡到了汉口。我突然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四十八师教导队招学兵的布告。我眼前似乎出现了生路，心中感到有点希望，连呼吸都急促起来了。我想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当兵去。这时我又想起了平日里老师语重心长的话语：“日本帝国主义正对我国东北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不能读书，何不效法班超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呢？我在校时和好几个同学曾议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只是想等自己读完中学，长大后再去。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了，生活把我逼上了当兵这条路，我也没多考虑，便跑到招兵站去报了名。招兵站设在汉口的刘家庙，招兵站的人对我说，入教导队和一般的兵有些不同，入伍后就可享受上等兵的待遇，毕业后先作军士用，后作军官培养。就这样，我于1930年下半年入伍当兵了。

四十八师师长徐源泉原属北洋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的部下，这时刚刚反正过来，投靠蒋介石，正在河南参加蒋介石与冯玉祥的战争。徐源泉在旧军队混了很久，他知道尽管自己投靠了老蒋，但老蒋是不会把他当作嫡系部队来对待的。他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牢牢地控制着一支部队，这就需要培养自己的干部才行，为此他决心成立教导队。他在汉口大街小巷到处张贴招兵布告，因为他是湖北人，意在自己的家乡招生。

少年从军，备尝艰辛

布告说是要招考教导队，实际上只是由教导队的军官随便问上几句就进去了。当时我们在硚口刘家庙受训，一开始只有一百多人，大家都睡在地上，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草，上盖一条灰